

守正创新 光影为犁

——以高质量纪录片谱写乡村振兴时代华章

■文孙密宏

新时代的田野,呼唤着与之匹配的影像记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壮阔实践,为“三农”题材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厚土壤。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作为“三农”宣传战线的国家队、主力军,始终以记录时代、服务“三农”为己任,近年来陆续推出《脱贫大决战——我们的故事》《鲜味的秘密》《绿色长城》《大戏记忆》《落地生根》《回农村干大事》《乡村有工匠》《大漠胡杨》等一批优秀纪录片,以深刻的主题、新颖的视角和动人的叙事,探索“三农”题材纪录片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行业提供了鲜活样本和深刻启示。纵观行业现状与自身实践,当前“三农”题材纪录片创作欲更上层楼,亟需在以下五个维度实现系统性突破与升级。

立“全景振兴”的选题观,敏锐捕捉乡村振兴各领域的生动实践。例如《绿色长城》系列将镜头对准中国北方的荒漠化防治和南方的红树林修复,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展现生态振兴的宏大叙事。二是设立“全景观测”创作计划,坚持跨行业跨领域资源整合,紧盯乡村振兴这一主题系统规划创作方向,既聚焦于粮食、安全、科技创新等“国之大者”,也深入挖掘乡村善治、非遗活化、新型农民培育等“关键细节”,构建一个层次丰富、互为映照的“三农”题材纪录片选题谱系。三是鼓励“多棱镜式”题材开掘,例如《回农村干大事》聚焦青年返乡创业的现实挑战,《乡村有工匠》聚焦乡村能工巧匠通过技艺带动致富的艰辛历程,二者共同丰富了“乡村振兴”的叙事层次。

叙事精维：从“宏观说教”到“微观实证”

传统的叙事模式往往依赖权威解说配以对应画面的单向灌输,这种“上帝视角”易使作品与观众产生疏离,难以吸引年轻受众。同时,盲目套用商业类型片的强冲突、快节奏叙事,又可能导致对“三农”题材特质的扭曲。叙事革新势在必行。核心在于精研“微观实证”的叙事语法。通过对具体人物在具体事件中完整行动链条的贴身记录,让故事自我呈现,让情感自然流淌。例如《脱贫大决战——我们的故事》,没有宏大的说教,而是通过深入十几个偏远贫困的乡村,聚焦“最难啃的硬骨头”,真实记录黄河滩区易地搬迁中艰难复杂的思想工作、高校专家团队在云贵山地进行产业发展的屡败屡试、投身山乡教育的支教者克服重重困难春风化雨般为孩子们点亮心灯的感人至深的过程,将脱贫攻坚的艰巨性、复杂性与人性的坚韧、温暖展现得淋漓尽致,其说服力和感染力远胜于任何总结报告。同时需善用技术赋能“沉浸式”表达。例如《鲜味的秘密》运用微距摄影、高速摄影、延时摄影以及广告拍摄等特殊技术手段,将食物生长、转化的细微过程,演化为极具视觉美感与科学奇观的动态画卷,让抽象的农耕智慧、食品加工和人类的美食哲学“可视可感”。还要大胆探索符合题材特性的新手法。《大戏记忆》以纪录片形式和电影手法呈现经典大戏背后的感人故事,用虚拟现实等创新技术再现名家名段,充分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打捞沉淀的时代记忆。农影中心计划设立“叙事创新实验室”,通过案例研讨、创意工坊等形式,探索符合纪实美学的悬念营造方法,尝试互动纪录片、VR纪录片等新形态,持续提升创作队伍的叙事“工匠精神”。

传播扩维：从“单向输出”到“融合赋能”

“三农”题材纪录片普遍面临传播渠道单一、受众覆盖面有限的困境。不少作品止步于传统平台的“一轮播出”,社会价值未能充分释放,没有形成“作品—话题—行动”的价值转化链。新媒体平台的内容呈现又常常陷入简单拆条、二次剪辑的窠臼,缺乏针对不同平台

特性的定制化传播策略。这种传播短板使许多优质“三农”题材纪录片“养在深闺人未识”,社会影响力与投入成本不成正比。必须重新定义传播的终点,构建融合赋能的新生态。首先是渠道融合,坚定实施“大屏小屏协同、线上线下联动”。农影中心打造的“中国三农发布”新媒体矩阵,覆盖全网,粉丝数千万,为纪录片转化为短视频、系列话题,实现“破圈”传播提供了强大支撑。其次是功能延伸,推动作品从“可看的片子”向“可用的资源”转化。例如,将《脱贫大决战——我们的故事》这样的精品,系统转化为乡村振兴干部培训案例教材、高校思政课教学素材,让影像直接服务于人才培养和经验传播。再次是价值转化,探索“内容+产业”联动模式。农影中心成立产业服务基地,探索“内容+电商”整合新模式,直接为农产品品牌塑造与销售开辟新路径,让影像传播深度融入乡村产业发展链条。最后是对外传播,积极推进“国际化”表达转型。例如《绿色长城》《落地生根》《大漠胡杨》等作品,通过多语种译制与国际平台传播,向世界讲述中国乡村振兴的生动故事,实现了从国内传播到国际对话的功能跃升。

机制聚维：从“分散作业”到“系统作战”

“三农”题材纪录片发展面临资源分散、产业链不完整的制约。精品创作往往依赖个别团队或导演的“心血来潮”,尚未形成稳定、可持续、可复制的系统化生产能力;制作机构各自为战,缺乏有效的资源共享平台和协同创作机制;投资渠道相对单一,过度依赖政府项目和媒体机构自有资金,社会资本参与度低。资源分散、产学研脱节、评价体系单一等问题,制约着整个行业创作生产力的解放与长远发展。系统的竞争力源于前瞻的机制设计。首先是构建“开放式共创平台”。农影中心应发挥“国字号”平台优势,联合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基层单位与行业专家,建立常态化选题咨议与资源对接平台,实现信息互通、资源互补、成果共享。其次是实施“实践型”人才培养计划。与高校合作开展“青年导演驻村创作”项目,通过导师带徒、项目实操,培养懂农业、爱农村、善影像的复合型创作队伍。再次是完善“价值导向”激励体系。设立专项创作基金,重点扶持具有深度、创新性、长期跟踪价值的项目,建立兼顾社会效益、艺术品质、传播效能与专业口碑的综合评价机制,引导创作脱离“唯流量”“唯速成”的误区,回归纪实本源与时代使命。

总之,推动“三农”题材纪录片繁荣发展,是一项关乎时代记录、文化传承与价值引领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我们以“守正”坚守人民立场与乡土情怀,以“创新”拥抱全媒体时代与乡村振兴的万千气象。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愿与业界同仁一道,继续以光影为犁,深耕希望的田野,用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全景式描绘新时代山乡巨变,生动讲好乡村振兴的中国故事,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注入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

(作者为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从专业档案到国家文化资源

■文徐驰

从边缘到中心:电影艺术档案步入国家文化战略视野

长期以来,电影艺术档案工作在行政隶属上归属于影视管理部门,在社会认知中也被视为电影行业的内部事务,处于档案事业的边缘地带。直到近期,中国电影资料馆(下文简称“资料馆”)编写的《“十四五”时期电影艺术档案发展报告》首次被纳入国家级的《国家文化发展报告(2025)》,标志着电影艺术档案工作在制度定位和象征意义上实现了“双升格”。过去国家档案事业的综合报告往往聚焦综合档案馆等传统档案领域,电影艺术档案鲜少出现在此类文件中。此次将电影艺术档案纳入《中国档案事业发展报告》释放出强烈信号:电影艺术档案不再只是影视圈内“关起门”自存自管的“小仓库”,而是被认可为具有公共文化价值和历史文化象征意义的资源。电影艺术档案因其承载的珍贵影像遗产,正式进入国家文化战略视野,大大提升了电影艺术档案工作的社会关注度和文化地位,相当于赋予电影艺术档案“国家文化名片”的意义和价值。正如《电影艺术档案管理规定》(2010)所强调的:“电影艺术档案是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这一定位在国家文化报告中得到体现和强化,电影艺术档案真正成为国家文化版图中的一页。

同时,电影艺术档案工作机制正从行业管理走向更高层次的统筹。以往资料馆主要接受国家广电部门领导,业务上受国家档案局指导,但在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中缺乏明确位置。如今将电影艺术档案发展情况纳入国家文化发展报告,意味着其工作成效和规划目标被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评价体系。这预示着电影艺术档案工作将获得更全面的政策和资源支持。例如,在规划制定、经费投入、人才培养等方面得到统筹考

虑,并享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等方面的扶持。电影艺术档案管理由专业部门的内部事务,上升为国家文化治理的重要一环。电影艺术档案工作的财政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安全保障等有望得到制度性加强,管理权限和职责定位更加清晰。可以说,电影艺术档案正式进入“国家账本”,为未来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电影艺术档案的独特价值：影像文化与民族记忆

电影艺术档案工作被纳入中国档案事业的整体规划,首先是因为电影艺术档案具有其他档案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体现在影像文化传承和民族记忆凝聚等方面。一方面,电影艺术档案汇集了百余年来中国电影创作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胶片拷贝、剧本文稿、海报照片等。这些档案记录了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脉络,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美学风格和社会风貌,构成了宝贵的影像文化遗产。系统保存和整理电影档案,有助于延续中国电影的文脉,丰富中华影像文化的谱系。另一方面,电影以生动直观的影像记录时代,被誉为“国家记忆的缩影”。许多经典影片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和情感。电影艺术档案将这些珍贵影像妥善保存,使之得以穿越时空继续“讲述”历史。在赓续红色血脉、构筑民族共同记忆方面,档案(包括电影艺术档案)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电影艺术档案以影像形式留存着民族记忆,既具史料价值又饱含情感价值,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

融入档案治理现代化：契合“五大体系”建设

电影艺术档案能够跻身国家文化发展版图,不仅在于其价值获得了肯定,更因为其发展实践契合了国家档案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逻辑。“十四五”规划强调全面推进档案制度体系、资源体系、利用体系、安全体系、信息化体系建设。这一框架在电影艺术的档案管理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制度规范方面,相关机构明确了依法管理的路径。通过严格执行《电影艺术档案管理规定》等法规,确立档案移交与管理标准,使电影艺术档案逐步从行业管理走向国家统一规范。在资源建设方面,珍贵影像资料的征集工作不断深入。近年来中国电影资料馆积极征集修复散佚的经典老影片拷贝,丰富了国家级影像资源库。在利用服务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资料馆等机构通过常态化公众展览等建立档案资源共享平台,让档案资源从资料库真正转化为大众文化服务的途径。在安全保障方面,针对胶片易燃、易损特性,资料馆建立了北京和西安两大恒温恒湿电影胶片档案库,并结合数字化异地备份确保档案的长期安全。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加快推进影片数字化修复进程。自2006年启动“电影档案影片数字化修复工程”以来,资料馆持续推进影片的数字化保护与修复工作,十余年来已完成众多

影片的数字化转存与修复。电影艺术档案机构还建立了线上档案数据库和数字资源服务平台,推动电影艺术档案融入“数字中国”建设。这些举措使电影艺术档案工作与国家档案治理现代化目标同频共振,在制度、资源、利用、安全和信息化各方面全面对接综合档案体系的发展要求。

数字化修复：迈向国家文化工程的实践路径

在“十四五”时期的国家文化建设框架中,电影艺术档案的数字化修复工作不仅是一项专业技术措施,更被纳入了国家文化工程体系,成为电影艺术档案从专业档案向国家文化资源转型的重要实践路径。老电影的数字化修复被明确赋予“公共记忆工程”的属性,成为保存红色记忆和历史影像的重要机制。许多革命历史题材和新中国早期影片,由于胶片载体老化,正面临不可逆的损毁风险。如果仅将其视为行业内部资料,其修复和保存难以得到足够重视和投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资料馆自新世纪初系统开展老影片的抢救性修复工作,将《永不消逝的电波》《林海雪原》《白毛女》等承载党史国史记忆的经典影片列入重点修复序列。通过数字化手段,这些影片不仅得以永久保存,也被重新定位为传承党史、新中国史与集体记忆的重要文化资源。在这一过程中,电影艺术档案的功能实现了转向:从单纯保存行业作品的专业档案,转变为记录国家历史记忆的影像载体。

数字化修复同时深刻改变了电影艺术档案的利用方式,使其从内部专业资源转化为面向全社会的公共文化资源。修复后的老电影不再束之高阁,而是通过资料馆艺术影院、新媒体平台专题展,以及电视和新媒体平台重新进入大众文化空间。实践表明,经典影片的修复重映往往引发观众的热烈反响,使电影艺术档案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代观众的重要媒介。档案资源由“保存”走向“传播”,电影艺术档案不再只是电影行业的历史资料,而是直接参与当代文化生活、塑造公共记忆,体现出国家文化资源应有的公共属性。正如资料馆的修复专家所言:“老电影是民族的文化瑰宝,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现在有很多修复过的影片拿出来公映,比如抗日的纪录片,具有还原历史真实的作用”。通过让经典影像重新走进人们的生活,电影档案进一步发挥了红色文化传承和民族记忆凝聚的作用,彰显出电影艺术档案的时代价值。

在“十四五”国家战略引领和政策支撑下,电影艺术档案通过数字化修复这一关键路径,实现了多层面的角色转型:在功能定位上,从服务电影创作生产的专业档案拓展为传承国家历史记忆的文化载体;在利用方式上,从封闭的行业资料转变为面向全民的公共文化资源;在体制保障上,从行业部门支持走向国家文化工程的全面保障。这一系列转型举措使电影艺术档案真正融入国家文化发展的整体格局,成为承载中华影像文化遗产、服务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国家文化资源。